

海外看中国

数据

世界更懂中国经济韧性和潜力

新华社记者 韩墨 谢鹏

盛春时分,中国经济再次感受“倒春寒”。继第一季度经济增速放缓至7%后,国家统计局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前四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等指标触及历史低位。4月的社会零售额和进出口数据也较为低迷。

过去几个月里,这种“不及预期”的统计数字一再出现,海外媒体和专家们如何看待中国经济走向?虽然仍有人偏好各种版本的中国经济“崩溃论”和“硬着陆”预言,但越来越多的专家和机构开始以更平和、理性和长远的眼光审视中国经济的肌理与风貌。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这没什么可惊讶的,它本来也是今年中国政府的目标”,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文章写道,“更值得惊讶的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消费超过了投资、服务业超过了制造业、内需超过了出口”。

高盛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提醒道,要知道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三国之和。“即使经济增速放缓至7%,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仍将达到7000亿美元左右。日本的经济增速必须达到14%,才能产生中国那样的影响”。

在不少海外受访专家看来,中国有足够的战略纵深抵抗经济下行的压力,即决策层所强调的“韧性”。俄罗斯高级经济学院经济学家布图汉诺夫认为,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始终以“稳健”著称。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不仅没有陷入衰退,还保持了增长,足以证明中国经济的抗压和抗风险能力。

“中国政府有防止严重经济金融危机的资源和行政能力。中国的官方债务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还有大量国有银行和企业,其巨额外汇储备和经常项目盈余确保中国不会受外债撤离的影响”,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金融学家斯蒂芬·格伦维尔说。

在法国经济学家尼古拉·巴韦雷看来,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1年美国网络泡沫破灭再到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中国每次都能安然渡过危机或者率先从中脱身,“关键的王牌就是这个14亿人口的大国能以惊人的灵活性实施改革”。

巴韦雷的看法与英国《经济学家》新近的论断颇为相似。这家周刊在4月中旬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经济的强

健体魄将得益于它正在进行的“静悄悄的革命”:在财政、金融和行政三个至关重要领域推行一系列改革,具体包括放松对利率、汇率和跨境资本流动的管制,加强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债务清理,以及减少官僚作风、简政放权等。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丹尼尔·奥尔特曼说,过去7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率其实一直在适度放缓,从14.2%降到7.4%。“中国经济‘新常态’并不是一个新情况,而是表明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为避免收益递减,中国就必须不断变革,调整其经济结构,使其商业环境更具有改革和创新精神”。

变革的中国将有更多的潜能和优势被开发出来。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对此评论说,举世皆知中国人勤劳、具有创业精神和重视教育。眼下中国仍有约半数人口居住在农村,中国可以通过城镇化,获得生产率提升的新空间,从而弥补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

沃尔夫认为,按照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规划,中国将建立更可预测的法律体系,增加家庭和公共消费,这些可以进一步释放潜力,再次实现20年的追赶性增长,其步伐也会比近几十年更加稳健。

改革创新实践,而不是单纯的增长数字,日益成为海外人士对中国经济的核心考量。“如果把‘新常态’简单当作北京创造的用来降低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的时髦词汇,那你就错了”,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文章说,“中国正主动地采取全面的深度改革,构建一个增长稍缓但质量过硬的繁荣社会。”

这篇文章特别提到,为了应对产能过剩和加快产业升级,中国已把改革和创新作为“最强大的驱动力”——中央政府已减少或下放了数以百计的行政审批事项,为市场腾出更多空间,同时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发展规划,通过互联网主导的创新加速中国制造业引擎。

海外观察家们热烈谈论着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从北京到北海,为何每个人都在努力成为这个国家的马克·扎克伯格(脸谱网站创始人)?”这是专栏作家蕾切尔·卢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的最新文章标题。

她写道,在中国,“创业文化不断生根发芽,尤其是在中国年轻一代中间日渐风靡,成为一种受人欢迎的变

化”。而中国领导人也不断要求为中小型企业减少繁文缛节,并充分利用互联网商务的力量。中国采取的方法似乎正取得成效。数据显示,2014年登记注册的新公司达到365万家,比前一年增长了46%。

“创新正在成为改变中国经济游戏规则的力量”,国际智库东亚论坛研究员德赖斯代尔说,“中国的快速和互联网金融服务已是世界级的。大型机械、电气设备和手机等产品的制造商也在加速追赶全球领先者。中国正迅速成为一个充满创新机会的中心,而这几乎是一场未被注意的革命。”

应当看到,这种创新革命尚未完成,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旧引擎还处于关键的衔接阶段,加之人口红利衰减、投资拉动效应趋缓、外需不振等因素,中国经济时常伴随转型阵痛,近来的短期数据也印证了这点。而两年多来,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宏观经济治理的探索与实践,让越来越多的海外观察家对这个国家的走向充满信心。

“尽管迄今为止已采取多种宽松努力,中国决策者仍保留着大量火力,离采取全面刺激措施还很远”,这是彭博社经济分析师的判断。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中国战略与发展部主任劳里·皮尔西说:“中国的优势在于独特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当决策者寻求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拥有可以向多个方向调整的经济杠杆。”

多次到访中国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评价说:“中国的政策精英如今比改革开放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老练,并有能力在必要时快速灵活地制定应对政策。”

虽然有不少专家认为,在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内实施如此大手笔的结构性改革,在其他国家从未有过,可能引发新的不确定性,吉姆·奥尼尔仍认为,中国经济的系统重要性已得到世界认可。中国近来的国际成就,特别是赢得英法德意等国对建设亚投行的支持,表明“中国对成功解决自身问题的高度自信”。

“中国领导人明白他们需要做什么”,刚刚出版新书《与中国打交道》的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说,“这也正是我对中国的改革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的原因所在。”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专电)

(参与记者:吴刚 李铭 叶书宏 吴心翰 吴丛司)

0.3%

德国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本报柏林电 记者王志远报道:德国统计局日前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德国一季度季调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去年四季度德国经济增长0.7%。

统计局表示,德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国内,私人消费和公共消费都有所增长。建筑业和装备投资也比上一季度有明显提高。就业人数同比增长0.7%,达4240万。然而,以往抢眼的外贸数据则拖累经济增长。初步统计结果显示,虽然今年一季度德国出口环比有所增长,但进口增长更为强势,外贸盈余明显减少。

21.8%

俄罗斯农产品出口下降

本报讯 记者赖毅报道:根据俄罗斯农业部日前公布的数据,今年2月至5月初,俄罗斯出口农产品453.4万吨,同比下降21.8%。其中,小麦下降幅度最大,从去年同期的386.8万吨下降至153.9万吨,降幅超过60%。大麦出口从去年同期的45.3万吨上升至162.3万吨,玉米出口从去年的168.1万吨下降至122万吨,其他粮食出口为15.2万吨。

为稳定国内粮食市场,俄罗斯政府从2月1日起对小麦征收售价15%再加上每吨7.5欧元的出口关税,且关税金额不低于35欧元/吨,这项政策将持续到本年度中。这是俄罗斯小麦出口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

6.4万亿日元

日本经常项目收支盈余大增

本报东京电 记者闻海防报道:据日本财务省统计,2014年度日本经常项目收支出现7.8万亿日元盈余,比2013年度大增6.4万亿日元。尽管日本贸易收支仍有6.5万亿日元的赤字,但由于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跌以及海外游客猛增,日本的国际收支出现大幅盈余,扭转了经常项目收支连续下降的局面。

短 评

森林管理应纳入人发展战略

本报联合国电 记者张伟报道: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现任主席、奥地利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吉克在联合国森林论坛第十一届会议的高级别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要想实现人类共同憧憬的未来国际森林安排,必须将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各级可持续发展战略之中。中国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张永利当天与会并发言,强调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林业可持续发展,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并将保护和改善生态纳入国家发展整体战略。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主席萨吉克说,联合国有望在今年9月针对2000年千年首脑会议以来全球发展环境发生的许多变化,通过一个统一、普遍适用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

泰国为中国展商定制扶持政策

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道:记者从在上海举办的泰国会议展览局展览商务论坛上获悉,泰国展览业将继续加强与中国的业务往来,该局已为中国展览贸易商专门制定了最新的“商务连接”市场扶持政策。

这些针对中国市场的特别政策有3方面内容:“连接泰国”,为会议、奖励旅游、论坛和展览业客商等团体提供补贴及现场商业配对;安排机场特别通道的贵宾礼遇;畅通游览曼谷的欢迎礼包。

泰国会议展览局展览活动部总监赵蕊介绍了针对参加泰国展览会的专业团体制定的“商务连接”补贴,每一位专业买家在泰国的展会上完成3组商务洽谈即可获得100美元补贴。能够申请该项补贴的机构包括商会、行业协会、海外行业出版机构、海外非盈利机构及召开会议、奖励旅游、论坛和展览业业务的旅行社。

印尼将放松外国人购房限制

本报雅加达电 记者田原报道:印尼财政部日前表示,政府将允许外国人购买印尼高档公寓,购房者仅需缴纳5%的持有税,且可从所得税中予以扣除。上述举措被认为是旨在促进印尼房地产市场发展。

印尼房地产协会主席艾迪表示,目前印尼不允许外国人在当地买房,导致不少外国人假借当地人名义买房,“我们希望这项政策尽快落实,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市场并刺激印尼经济加快增长”。为配合该政策执行,印尼银行行长阿古斯表示,央行将于本月降低首付比例。



西班牙东北部小城赫罗纳2015年鲜花节于5月9日至17日举行。节日期间这座古老的小城华丽变身成为一个大花园。图为鲜花节期间小城赫罗纳街头鲜花装饰。 新华社发

中国经济的海外迷思渐多理性

新华社记者 陈济朋 谢鹏

三十多年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

这样的奇迹让置身其中的中国人难免感觉世界变化太快;而对于许多海外的经济学家来说,却是另一种感慨: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克服了许多看似难以逾越的挑战,时不时让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众专家和学者感到惊叹,也感到困惑。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也有此困惑。这位曾时不时对中国经济发出危言预警的美国经济学教授今年初在香港演讲时说,中国成为经济学研究一个如此重要的焦点,而又是一个有难度的研究领域,这让他感到有点儿“恨意”。

中国经济“崩溃论”多年来虽然每每落空,却也往往在经济调整转型的节点出现。只是渐渐地,随着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即便是中国面临经济下行压力而仍坚持推进改革的当下,简单的“崩溃论”也日渐式微。

从改革进程的风险,到增长数据的变化,再到降息降准……中国经济决策者在风险管控、政策沟通和预期管理上取得了长足进步。虽然经济增速放缓,通过改革推进转型升级也伴随着挑战,但外部观察者越来越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少数国际媒体将中国最近的降准降息与美欧日的“量化宽松”类比,不过总体而言,在绝大多数海外学者和媒体观察中,中国的货币政策并非过度宽松。政经杂志《经济学家》网站文章一语道破两者的关键区别:“中国没有量化宽松的需要”。

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姚树洁认为,中国降息是希望通过降低资金成本来刺激经济增长,降息有利于促进投

资和消费。阿根廷经济学家马蒂亚斯·卡鲁加蒂认为,考虑到当前维持低位的通胀水平,中国通过降息维持经济增长可谓是理性的措施。

“量化宽松”的类比夸大了中国货币政策调整的幅度,尤其降准,部分是为了对冲外汇占款下降的影响。美欧日等国实施量化宽松,是利率降无可降也无法刺激经济复苏而被迫采取的非常规手段,而中国显然仍有充足的货币政策常规调整空间。

下调之后,中国的大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仍高达18.5%。在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澳大利亚—中国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詹姆斯·劳伦森看来,“这一数字不论是以国际标准还是中国过去的记录来看,都是非常高的”。

海外学者也注意到,即便在降息的同时,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定向宽松,“避免到处撒钱的做法”,引导资金流向有需求的实体经济部门。

尽管面临一定的经济下行压力,但中国决策者仍在努力推进市场化改革。在最近一次降息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也宣布扩大存款利率的浮动区间上限至基准利率的150%。海外媒体注意到,现实中很少有银行会一浮到顶,这意味着利率市场化的进一步推进。由于贷款利率早已完全放开,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条件已成熟。

金融市场化改革有风险,但中国决策者的掌控可谓稳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学院院长、新加坡管理大学计量金融学副教授白士洋认为:“中国利率改革的风险一般主要是指地方政府债券和影子银行,这些基本还是可控的。”采取让地方政府发债的办法,意味着地方政府仍要承担发债的成本,可促自律。发地方债也有利于丰富

债券的种类,促进中国债市的发展。至于影子银行,虽然有一定规模,但仍处于可控的范围。银行业已经向民营企业开放,这会让影子银行慢慢从地下走到阳光中。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中国决心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放松资本账户管制,在多个自由贸易区试验新的经济管理思路,在政府管治层面则注重简政放权,同时也加强反腐败的努力。

克鲁格曼说,研究中国经济让他感到“害怕”,因为中国需要进行的调整幅度可谓巨大,其中蕴含复杂的风险。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未来还是属于中国的”。

在海外专家看来,中国在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仍有充足的宏观政策空间保持经济的稳健和韧性。日本富士通总研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赵琳琳说,随着经济体量增加,经济增长率虽然有所降低,但同样可以保障就业。

高盛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的经济表现一直让我惊异。虽然中国经济毫无疑问面临诸多挑战,但关键的问题是,这些挑战搞垮经济的可能性有多大。”许多国际观察人士一直担心中国的房地产和信贷市场,但奥尼尔在博鳌和一些人交谈后得出结论:这两个问题大概都是可控的。

还有反腐败,也会暂时拉低部分需求,影响增速,但却契合经济发展的长远需要。卡鲁加蒂认为,反腐有利于提升政府公信力和经济管理能力,提高行政效率,营造更加有利于市场经济活动的环境,“毫无疑问,这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新华社北京5月14日专电)

(参与记者:徐海静 张春晓 周檬 许缘 马玉洁 黄继江)

评估中国经济切莫断章取义

——专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首席代表阿尔弗雷德·席普克

新华社记者 傅云威

中国会否启动量化宽松(QE)?中国经济是否有失速风险?大规模刺激政策是否不可避免?……围绕外界针对中国经济的种种臆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首席代表阿尔弗雷德·席普克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外界评估中国经济时不宜断章取义,而应重视中国经济的独特优势和增长潜力。

谈到所谓“中国版QE”,席普克告诉记者,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些欧美发达经济体在接近零利率且财政能力有限之际被迫采取QE政策,其实是传统货币政策穷尽时的最后选项。

他说,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当前中国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处于相对高位,中国有充裕的传统政策工具,足以影响货币市场。因此,外界仅凭中国近期采取宽松措施这一点,就猜测中国即将采取QE政策,显然不甚妥当。

谈到中国经济增速,席普克说,虽然出现调整,但是从IMF对2015年和2016年的预测数据看,中国和亚太地区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领军者。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不是孤立现象,而是地区现象的一部分,且有其积极意义。

“我们看到,中国政府愿意容忍更低的增速,以解决经济脆弱性,促进经济转向自主增长的轨道。”席普克说,“通过结构性改革,促进资本和劳动力流向产出更高的领域,中国经济中长期将赢得更可持续的增长。”他同时认为,中国央行近期释放流动性的举措有助于缓解信贷偏

紧,利于避免经济过度减速。

席普克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出现减速之际,就业市场却表现稳定,这是中国经济独特而有趣的现象。他分析认为,一方面,这表明在经济结构调整背景下,中国服务业开始兴起,吸纳大量就业;另一方面,这可能与国内移民流动特点有关:来自农村或小城镇的移民会伴随经济形势变化进入或退出大城市,这在客观上缓解了就业压力。

围绕经济刺激的话题,席普克说,判断中国政府是否启动了刺激措施,要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结合起来,全面分析。他说,在中国,大量预算项目由地方政府执行,今年中国开始施行新的《预算法》,强化了对地方预算的约束,使地方财政支出受到限制。

他说,中国中央政府适当扩大财政支出,很可能是为弥补地方财政收紧的缺口。因此,外界若据此判断中国将开启大规模刺激措施,是不全面的。

谈到中国多领域改革措施,席普克指出,李克强总理近期多次释放支持创业和创新的信号。实际上,继续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简政放权、增大开放力度,都利于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使个人有机会尝试创业和创新。

“所有这些改革举措都将利好私营部门繁荣,并崛起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他说,“我完全赞同中国潜力巨大的判断,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我对此感到乐观。”

席普克表示,自来华担任现职以来,中国经济的开放力度和创业的热潮让他深受感染。“我注意到,周围越来越

越多相识的人告诉我,他们已开始独立创业。数周前,我随IMF总裁拉加德访问上海时,见到了一些企业家,给人极深印象。我认为这种现象(创业热潮)会伴随开放深入而不断加强。”

席普克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正转向内生增长轨道,即从以往基于投资、出口的模式转向更加依赖消费拉动的模式。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金融改革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他说,推动金融自由化和对外开放,将使中小企业获得平等的融资渠道,创造促进创新的环境,也有利于推出新的金融产品,满足个人和企业需求。

席普克举例说,当前中国金融市场需要更多所谓“对冲机制”,人们可借以对冲风险和不确定性。“我认为,传统金融机构在此领域大有可为,有条件提供相关服务和产品。伴随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互联网金融新业态兴起,预计中国金融界将有机会创造利润可观的新金融产品。”

谈到“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的影响,席普克说,IMF认为基础设施瓶颈是遏制亚洲地区增长潜力的显著障碍,亚洲基建领域急需大量投资。“我认为,‘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是非常重要的投资载体,有利于弥补亚洲基建市场的投资缺口,帮助释放相关国家的增长潜力,这对中国和其他国家都有利,将创造双赢的局面。”

席普克表示,尽管IMF不是开发银行,不从事基建投融资业务,但IMF热切期望与亚投行合作,并分享在相关领域的经验。(新华社北京5月14日专电)